

長
短
錄

夏衍 吳晗 廖沫沙
孟超 唐弢

杂 文 丛 书

长 短 录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1980年2月·北京

长 短 录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3 $\frac{3}{4}$ 字数：65,000

1980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：100,000

我又学到一点辩证法

——《长短录》出版感言

廖沫沙

“总之，要照辩证法办事。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。我看，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，提倡照辩证法办事。”

（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一月《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》）

—

《人民日报》副刊编辑室的同志将一本书样交到我的手上，我揭开上面的两页来信，一看书名，《长短录》三个字赫然在目。这才唤起我的记忆：原来我在《人民日报》副刊上也曾放过“毒”，欠下几笔“债”。但是十几年前，报纸、刊物上对《长短录》这个专栏是怎样批的？强加给我和我的“同栏”们的是些什么罪名？对这些，我竟没有留下任何印象。于是乎我同送书样的同志进行了一段简短的对话：

我说：“就这么几篇短文章，连‘四人帮’的文痞们在大批判中提都没有提过它，还值得出书，需要平反吗？”

他答：“谁说没有批判过？批了。这个样本就是当时排印出来，散发给人们写批判稿用的。——当然也该平反。”

我问：“他们是怎么批的？我好象没有见过。”

他答：“批你们对社会主义说长论短，评头品足。”

我“哦”了一声，赶紧“低头认罪”，眼睛落到编辑同志的来信上，那上面的几行墨笔字，倒也遒劲有力，好象铁蒺藜似的；但这回分明不会刺到我的身上，而是来替我伸冤保驾的。来信大意说：拟公开为《长短录》平反，出版专集。叫我写篇“感言”、“札记”之类。

我无可推托，只好说：“待我先看一遍，反省反省，再说罢。”

当我把书样摊在桌面上，想查看自己到底写过几篇什么文章的时候，不禁又吃一惊：啊，我在《长短录》用的笔名，竟是“文益谦”；开首第一篇《“长短相较”说》就是我写的，署的名就是这腐气十足的三个字。十七年之后来重睹这个笔名，几乎有似曾相识的味道。既承认它是自己的笔名，又觉得很陌生：当时为什么竟然取上这么一个老气横秋的名字？

于是乎引起我回想到写《“长短相较”说》这篇短文前后的一些心境和思想线索。

二

我那时正在热衷于学习辩证法。

我读马列主义的书，不可谓不早，二十年代中期就开始有所接触，三十年代以后这类书成了我的主要读物，“唯物论”、“唯物史观”、“唯物辩证法”之类的词儿，成天在脑子里转个不停。可是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却不免自己好笑：那时对书中所说的内容，其实一窍不通。真正望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轮廓，多少摸到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一些门道，是在五十年

代，而且是从毛泽东同志的几篇著作得到启蒙的。读过他的哲学著作，再去读马列书，尤其是读到马列书中有关哲学的篇章、段落，或者是读到他们运用辩证法分析问题的地方，就好像瞎子忽然睁开了眼睛，比过去看得清楚明白得多。但是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过的：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，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。……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，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，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。”（毛泽东：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）恩格斯也说过同样的话：“可惜人们往往以为，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，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，那就算充分地理解了新原理，并且立刻就能应用。”（恩格斯：《致约·布洛赫的信》）可见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，从完全不懂到懂得点皮毛，从稍懂一点到懂得更多，从大体懂得到运用它去观察和处理问题，是一个很短的距离，从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来说，则简直是万水千山不等闲。

三

在我写《“长短相较”说》之前，我还写过一篇谈《周易》的文章，发表于《人民日报》的第三版，留存的剪报，后来被打砸抢抄抓的人抄走了，以致我现在连文章的标题都已忘记。我只恍惚记得，那是谈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变革的。就是说，我那时已深感客观世界在“变动不居”，而人们的主观世界却往往跟随不上。那里面也谈到孔子及其门徒在讲解与注释《易经》时，虽也承认世界在变动，却总认为只是在循环圈里兜圈圈，不承认世界在发展、在前进。因此我引了经书中的一些话，对他们加以嘲讽，当然同时也是在警

告自己：要“居安思危”。

也就在那时，我还在那部经书中读到“满招损，谦受益”这类话，我觉得，这是大约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总结出来的一条宝贵经验，所以在那一阵，这两句话常在我的脑际盘旋，当我写《“长短相较”说》的时候，下意识竟然起了作用，随手就写出个“文益谦”的笔名来了。

我当时写那篇短文的一些思路，读者可以从该文看得清楚。那不过是想介绍我学习毛泽东同志哲学著作时的一点心得，即认识客观世界的正确方法，是对任何事物都要“一分为二”，不要形而上学地看问题，“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，一切皆坏，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，一切皆好。”在谈到事物的“二重性”时，毛泽东同志引用《老子》中的“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”，来说明祸中有福，福中有祸的对立统一规律；这里，实际上是说明两层意义：一是矛盾的双方，依一定的条件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；二是矛盾着的双方，依一定的条件“各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”，即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的：坏事可以变成好事，好事也可以变成坏事；坏事有二重性，好事也有二重性。

这就是我写那篇短文时想要说明的东西，此外并无其它深意。但是老实说吧，按照我当时对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，所能达到的程度，实际上还只是上述第一层意义，即事物的一分为二，对立统一，对第二层意义，即对立着的双方互相转化，只是字面上接触到了，自己并没有真正理解。尽管毛泽东同志举了一些实例来作说明，我却不能够充分地加以阐述。因为我那时并没有真正懂得这一点。

从写《“长短相较”说》到现在《长短录》将要成书出版，

时间上越过了十七年。这十七年来客观世界的变化，也引起我的主观世界的变化，现在我对辩证法的理解，总算比十七年前又前进了一步，特别是对于事物的对立着的双方，依一定的条件必然要互相转化，我都亲眼看到、亲身尝试了。对于这一点，现在有了更深切的实际的感受，因此也认识得更深刻。

写到这里，我忽然想到，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中，有相当一部分人，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并不全都了然，或者只有片面的理解；即使口头上也挂着辩证法词句，却往往理论不能见之于实践，甚至言与行相违反。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，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猖獗起来的。所以我觉得，把恩格斯讲辩证法的主要规律的一段话，抄在这里是很有必要的。因为这段话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它的全部内容，一个字也不容许抹掉；它的每一句话所表达的规律，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——自然界、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起着作用。抄下那段话，一则可以加深自己对它的记忆，二则也可以供读者或有同好的人们参考、研究：

“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。主要规律：量和质的转化——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——由矛盾引起的发展，或否定的否定——发展的螺旋形式。”（恩格斯：《自然辩证法》·〔总计划草案〕）

四

读者看到这里，也许会发出疑问：你这篇“感言”写了

这么长，老是在“对立统一”、“辩证法”上绕圈子，既不谈《长短录》出版成书的意义和理由，也不联系它被批判的实际经历，对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罪恶更无只字声讨，岂不是空话连篇而言之无物么？

我在前面唠叨的几段文字和刚才抄下恩格斯的那段话，可以用来解答读者的这种疑问。我是在要求读者（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——我现在也是这本书的读者之一），无论是对《长短录》本身的文字、内容和它所遭逢的命运，无论是对它今天的出版成书或十七年来客观世界的风云变化，只有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亦即辩证法，才能够得到较为正确的认识、较为正确的解释和说明。至于对我自己十七年来的遭逢、际遇、耳闻、目睹、身受的一切，我不过是把它看作我学习辩证法的又一进程而已。因此我把这篇“感言”，题名为：《我又学到一点辩证法》。

末了，我要在此向参加过《长短录》专栏写作的（总计有六人）、遭受摧残而不幸逝世的三位——吴晗同志、孟超同志、陈笑雨同志——深致哀悼、惋惜之忱！

我所惋惜的，是他们三位同志不能同我们后死者一样，看完这一段历史辩证法的全部过程；也不能继续用他们的笔为新的长征贡献力量。

1979年7月

实事求是——我们的为人的道德

唐 弢

大概是一九七五年吧，有人告诉我，夏衍同志已经回到自己的家里。我想约个时间去看他。过了几天，他的女儿沈吟来访，说是夏衍同志的意思，我的身体不好，暂时可以不必去。沈吟同志劈头第一句话，就是：

“爸爸说，关于《长短录》的事，对你很抱歉！”

十年以来，我第一次听人说表示抱歉的话。出于意料的是，偏偏说这话的是夏衍同志——他不需要向我抱歉什么。又偏偏是为《长短录》而发——说起《长短录》，惭愧得很，虽承夏衍同志指名要我参加，而且除他本人之外，其余吴晗、廖沫沙、孟超三位，又都是我素所钦佩的在杂文写作上各具风格的作家，可惜我那时住在西郊，忙于编写教材，只用“万一羽”笔名，发表了两篇文章，是五人中写得最少和最不称职的一个。因此，如果真要抱歉的话，就应当由我先向夏衍同志、先向《长短录》表示抱歉了。

至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捏造我的罪状，打从《长短录》入手，罗织构陷，深文周纳，完全是另一回事。即使没有《长短录》，我也是无法幸免的，这已经由后来的事实充分地证明

了。文化大革命开始，从《海瑞罢官》到《三家村札记》，到《长短录》，一个接着一个。用当时那些人的话说，叫做“顺藤摸瓜”，不管大瓜小瓜，摸一个，便捣碎砸烂一个。还在一九六六年，江青就说：“什么三家村，四家店！什么合伙公司！统统都要给我打倒！”不久，两个用“外调”名义逼取口供的好汉，拍着桌子向我宣布：江青说的“合伙公司”，便是五人轮流执笔的《长短录》，它是“三家村”的分店。

我听了默然。

有什么可说的呢，在那个年头，在那些头上长角的好汉们的面前！

不过对于许多事情感到不能理解，也是促使我保持沉默的原因之一。记得那时的心情是：如果我真的错了，客观上——我以为只能是客观上——起了“四人帮”所说的作用，等我认识到了我可以认罪；如果他们错了呢？我的脑子里掠过一点什么，简直不敢往下想。我们的灾难深重的民族实在太不幸了！看来我的思想确实没有从禁锢中解放出来。我只是默默地安慰自己：万一中国革命发生波折，个人遭受一点磨难，也是劫数难逃吧，虽然我并不相信命运之类的东西。

按照那时的“舆论”，真理天生掌握在几个人的手里，他们是绝对正确，永远正确，从来就不错的，错的只是被捣碎和被砸烂的一群。我也是这群人里的一个。说心里话，为了党和民族的前途，我宁愿发现错的是我自己，而不是那些正在当权的人们。怎么办呢？使尽平生的力气挖掘挖掘自身的错误吧，可惜“觉悟”太低，虽经反复“帮助”，还是看不出这些杂文的毛病和症结之所在，自然谈不到什么认罪的问题了。我以为认罪是容易的，但得有事实。要我不顾事实，昧

着良心取悦于人，这做不到。我没有学过这样的本领。

当时《长短录》作为反面材料，已经排印出来，发到各地写作班、编辑部 and 高等院校去批判。我的所在单位也得了一本。别人情形不知道，我写的两篇，都被宣布为“别有用心”的大毒草。特别是当陈伯达、姚文元一伙合谋炮制的《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》发表，点了《长短录》的名，“分店”升为“总号”，又摘引我在《谢本师》里说的“作者‘所言者小’，读者‘所见者大’”那句话，加以歪曲和诬陷以后，周围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。我分明看到了一个文字狱的阴影，这个阴影不仅逐渐逼近，而且也正在不断扩大。

单就两篇杂文的内容而言，我仍然想不出有什么违碍的地方。虽然发表当时，就有人对《谢本师》提出不同意见，但这只是个别的意见。鲁迅说得好：“读者是种种不同的，有的爱读《江赋》和《海赋》，有的欣赏《小园》或《枯树》。”（《且介亭杂文二集，“题未定”草（七）》）由于读者体验不同，同一作品的内容也会造成不同的理解和印象。一部《红楼梦》，“经济学家看见《易》，道学家看见淫，才子看见缠绵，革命家看见排满，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……。”（《集外集拾遗·（绛洞花主）小引》）各执一辞，聚讼纷纭，前前后后争了一百几十年。文章，无论是一个单篇还是一整部大书，它能表现的毕竟只是社会的一角，生活的一个片断，因此作者表达的比文字多，有点言外之意，本来不算坏事情。但是，言外之意一变而为“别有用心”，那就糟了，同样是四个方块字，后者却已足够兴起一个大狱，它是一柄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。而在惯于耍弄“影射史学”和“阴谋文艺”的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眼里，视线所及，无非是“影射”和“阴谋”：一篇篇都“别有

用心”。这就是他们的人既然能象狗一样爬在地下，人就不妨而且也应该变狗的哲学的延伸。

我想说说我写两篇杂文的经过。

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所谓“师道尊严”的逆流，并不是突然出现的。大约是一九六一年或者六二年吧，师徒关系、青老关系已经很紧张，在一个小组会上，我听几个老艺人、老专家、老教师发言，个个感慨系之，在“后生可畏”的“畏”字上发了许多牢骚。千不该万不该，我也跟着感慨系之起来，不过我的感慨没有老先生们激烈，只是从章太炎《谢本师》谈起，主张前辈爱护后辈，要鼓励后辈赶上自己，超越自己；也主张后辈尊敬前辈，在坚持真理的原则下，遇到老一辈人思想跟不上形势，也要象章太炎对待俞曲园那样，存心“厚道”，留有余地。不过当时各种关系远比俞章事件复杂，因此希望读者能从所举具体事例中悟出更多的道理，做到“所见者大”。过了几月，我写第二篇杂文，事情更为简单了。那时中印发生边境冲突，包括苏联在内的有些国际舆论，颠倒黑白，偏袒印度；美国的杜勒斯甚至说世界上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我读了很生气，决定回答几句，指出他们的头脑和眼睛，也象废弃不用的器官如尾骶骨、耳轮筋、阑尾一样，已经退化到了徒具形式的地步，所以什么都见不到，看不清。这便是卑之无甚高论的全部内容：刺它一下，如此而已。

不料在胡扯蛮缠、穿凿附会成风的日子，问题却并不如想象之简单。旧时有所谓“正面文章反看法”，原是老百姓不相信反动统治者的诺言，从痛苦中总结出来的经验，早已成为过去的事情了。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为了达到篡党窃国的目的，实行愚民政策，打击所有正直的群众和干部，推行了一

套主观唯心主义的办法：张冠李戴，指鹿为马，一切都随心所欲。正如前面说过，《谢本师》谈的是大家关心的社会问题，却被扯到国际关系上，指为向修正主义讲“厚道”：投降敌人。《尾骺骨之类》点明国与国的关系，又偏要拉回国内，说“长期不再运用而逐渐退化到徒具形式”是影射年老无用：反对领袖。罪名就这样坐实了。判断的根据是什么呢？不是文字的含义而是题外的想象，不是本人的陈述而是“上峰”的意志，不是评议的结论而是事前的暗示。这样，在显赫的地位和革命的言辞掩护下，看起来，批判者也被批判者一样，大家都受了骗。

中国革命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插曲。

孤独给人以深思的时机。在那些日子里，随着事情的演变，我想得很多很多：为什么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能够一意孤行，欺骗了许多人？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受骗而不自觉？为什么有些人感觉到了而不敢说，不敢起来坚持和力争？为什么有一小撮人竟然附和他们，出卖自己的灵魂？为什么……？为什么……？

我想到了许多答案。重要的和次要的，正面的和反面的，我的眼前慢慢地明亮起来。阴影消失了。我想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弱点，也想到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处。我们从苦难重重的生活中挣扎过来，从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斗争过来，千锤百炼，逐渐成长。长期的习惯势力在我们身上留下种种封建的、不健康的因素，侵蚀着我们的思想，压扁了我们的性格，使我们有一个易受疾病感染的脆弱的机体；但是，我们毕竟是战斗过来的。而且正是同这些封建的、不健康的東西战斗过来的。在我们身上不可能有“百分之百的忍从”——“对于横

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”(《且介亭杂文二集·陀思妥夫斯基的事》)。人民是要抗争的，有朝一日，他们能够起来克服这些脆弱，战胜这些疾病！

我觉得我们的制度是好的，社会主义，但需要有许多具体的法律和规章去补充它，辅助它；我觉得我们的人民也是好的，勤劳奋发，但在某个时候，也就是当这个吵吵闹闹的插曲终场的时候，需要有一个涤荡灵魂、激发精神的道德运动。也许这样说太陈旧了吧，但这不是宗教仪式，我们需要物质的力量，也需要精神的力量，我是说要提倡一点我们的为人的道德——诚实的道德，勇敢的道德，实事求是的道德。做人要讲道德：“不看轻自己，以为是大家的戏子，也不看轻别人，当作自己的喽罗。”(《且介亭杂文·门外文谈》)说话要讲道德：勇于发言，言必有据。写文章、读文章要讲道德：不采取宁“左”毋右的办法，以指摘别人不革命，来显示自己的革命。总之，把这些贯串起来的主要是实事求是的精神。因此，在我看来，实事求是不仅是一个作风问题，同时也是一切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需要共同努力的道德标准问题。——我忍不住这样想。

现在，《长短录》准备单行出版了，我庆幸能在这个时候，将当时想过的这些意见重新写出来。

1979年9月15日于庐山疗养院二分院。

目 录

我又学到一点辩证法·····	廖沫沙	(1)
实事求是——我们的为人的道德·····	唐 弢	(7)
“长短相较”说·····	文益谦 (廖沫沙)	(1)
为话剧青年一代祝福·····	陈 波 (孟 超)	(4)
从点戏说起·····	黄 似 (夏 衍)	(6)
“谢本师”·····	万一羽 (唐 弢)	(8)
争鸣的风度·····	章 白 (吴 晗)	(10)
张献忠不杀人辨·····	陈 波	(12)
草木鱼虫之类·····	黄 似	(15)
一代诗史当铙吹·····	陈 波	(18)
谈写文章·····	章 白	(21)
也谈戏剧语言·····	黄 似	(24)
小学生练字·····	文益谦	(27)
联想·····	黄 似	(30)
还是小学生练字·····	文益谦	(33)
白蚁宫的秘密·····	陈 波	(36)
论不同学科的协作·····	章 白	(39)
难忘的日子·····	黄 似	(42)
不足为训的“厚道”·····	张毕来	(45)

郑板桥的两封家书·····	文益谦	(47)
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·····	黄 似	(50)
戚继光练兵·····	章 白	(52)
甘为孺子牛·····	陈 波	(55)
“教子篇”补·····	黄 似	(57)
从“扁地球协会”想起·····	文益谦	(59)
历史剧的题材·····	黄 似	(62)
漫谈聊天·····	陈 波	(64)
力与巧·····	黄 似	(66)
何必讲“打”·····	陈 波	(68)
陈老莲学画·····	陈 波	(70)
反对“花法”·····	章 白	(72)
跑龙套为先·····	文益谦	(74)
药也会变么? ·····	文益谦	(76)
谈“质”与“文”·····	陈 波	(79)
谈从望远镜中看人·····	陈 波	(81)
谈陈亮词旁引·····	陈 波	(83)
枫叶礼赞·····	陈 波	(85)
尾骺骨之类·····	万一羽	(87)
美国钢盔与生产工具·····	陈 波	(89)
《长短录》的始末与功“罪”·····	袁 鹰 姜德明	(91)